



美國對日本佔領政策的轉換

● 楊子震*

正如同 1946 年英國前首相邱吉爾「鐵幕 (Iron Curtain) 演說」、1947 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示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 及開始付諸執行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 以及 1948 年的柏林封鎖危機 (Berlin Blockade) 等所呈現的，美蘇間對立日益嚴重，東西冷戰的局勢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短短數年間，已然成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東亞地區亦於稍晚受到美蘇對立與東西冷戰的波及影響。朝鮮半島於戰後脫離日本的統治，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南部歸美國管理，北部歸蘇聯佔領。美蘇兩軍撤退以後，1948 年，大韓民國 (南韓) 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 柏林危機 (1948 年 6 月 24 日-1949 年 5 月 11 日)

(北韓) 先後於 8、9 月各自成立政府相互對抗，朝鮮半島呈現南北分裂。

在中國，於日本投降後，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間發生斷續不止的武裝衝突。儘管美國居中調停，「國共內戰」(Chinese Civil War) 於 1946 年中旬全面展開。最終

* 楊子震，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由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正式建國，同年底，由蔣介石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則敗逃至臺灣。政權甫建立，中共即於1950年2月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以「日本帝國主義再起」、「以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

」作為共同的假想敵。

為了遏止日本再次成為東亞地區和平威脅的可能性，佔領日本當初，由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General Headquarter of the Super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簡稱GHQ）係採積極推動「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方針。但隨著冷戰的進展，遂改採積極支援日本戰後重建與經濟復興，欲讓日本作為亞洲的反共防波



■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49年10月1日）

堤。1948年12月的GHQ「經濟安定9原則」與1949年2月的道奇金融緊縮政策（Dodge Line）皆為美國對日本佔領政策轉換的具體呈現。

1950年6月25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軍隊向大韓民國（南韓）發動全面性攻擊，「韓戰」（Korean War）爆發。韓戰不僅促使朝鮮半島的南北分裂固定化，更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東亞局勢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韓戰爆發後，美國立即在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提出控訴，通過決議譴責北韓為破壞和平的侵略者，決定由聯合國給與軍事制裁。於是設置聯軍司令部，同時給與南韓強力的軍事援助。派兵參與的國家雖多達十六國，大部分仍是美軍。同年11月，中共以本國防衛為理由，以「人民義勇軍」的名義派兵參戰。而韓戰的爆發與中共的參戰使美國於根本上改變對日本的佔領政策，由抑制完全變更為扶植。

如此一來，韓戰對日本自然有著重大的影響。美軍總司令部設置在東京，日本成為美國海空軍出擊與陸軍轉運補給的軍事基地。美軍亦漸次擴大向日本的工廠訂購大





批軍需裝備。而日本的產業，與美軍的「特需」結合，強化其為軍需工廠承包的角色。日本經濟獲得戰爭景氣的加持，當時的經濟不景氣為之消弭。總體經濟結構發生重大的變化，尤其促使其國際收支達到平衡。韓戰轉變了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亦成為其經濟復甦的契機。

在此國際情勢下，致力於早日簽訂媾和條約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力主以戰後復興為第一要務，同時以貿易立國為主要國家發展發向。在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上，則依賴美國的防衛，盡可能抑制國防費用。就吉田茂政權的觀點而言，關於日本是否以及如何重整軍備，並非基於國防的必要性，而是為了因應美國的要求，需以財政觀點加以研究的問題。此「輕武裝」、「經濟外交」的



■ 韓戰（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

政策方針，日後被稱之為「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又譯為「吉田路線」、「吉田原則」等）。日後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簽訂即為此方針的具體呈現。爾後，「吉田主義」逐漸成為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針。在此方針下，日本不但漸次完成了戰後復興，日後更躍升為在國際社會佔有重要地位的經濟大國。

■ 建議閱讀參考書目

1.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一九四五至一九九〇〉《問題與研究》41:5（2002年9-10月），頁13-40。
2. 松村岐夫、伊藤光利、辻中豐（吳明上譯），《日本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2005年）
3.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修訂三版）》（臺北：三民，2006年9月）
4. 趙翊達，《日本海上自衛隊：國家戰略下之角色》（臺北：秀威資訊，2008年）





5. 黃自進，《「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年12月）
6. 五百旗頭真（吳萬虹譯），《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年）
7. 佐道明廣（趙翊達譯），《自衛隊史：日本防衛政策之七十年》（臺北：八旗文化，2017年）
8. 北岡伸一（周俊宇、張智程、陳柏傑譯），《日本政治史：以外交與權力的雙重視角解讀從幕府到冷戰的關鍵時刻》（臺北：麥田，2018年）

